

云南民族学院
历史系编



民族·历史·文化



民族·历史·文化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惠荣
封面设计：杨德鑑

民族·历史·文化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民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字数：240千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81025-106-6/K·24 定价：4.50元

序 言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于1978年，是在我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中迅速生长起来的。

本系现设历史学和民族学两个专业，共有本科生334人，硕士研究生4人，教职员39人，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7人，讲师17人。迄今为止，已毕业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365人，硕士研究生6人。他们散布于全省各地，在大中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机构或政府部门从事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不少人在工作中作出了可喜的成绩。

这些年来，本系除国家统一规定的课程外，为了对学生加强专业训练，扩大其知识领域，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还增设一系列专业课或辅助性课程，如《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志》、《文化人类学概论》、《民族学调查方法》、《民族学调查技术》、《社会学概论》、《民俗学》、《博物馆学》、《史前史》、《地方志编纂学》、《文书学》等等。此外，还开设一些专题课，供学生选修，并举办不定期的“历史学讲座”和“人类学讲座”，邀请国内外专家来系演讲，活跃学术空气和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

在高等学校中，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仿佛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一个教师只有坚持进行科研，才能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这些年来，本系在科研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迄今为止，本系教师除参加全国性科研项目（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调查资料丛刊》、

《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及高等学校教材(《世界史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等)编写外,个人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专著,译作已有八种,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有些论著如《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汪宁生)、《纳西族简史》(王宏道主编)、《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年代、印品真伪辨误与鉴证》(吉敦渝)、《宋代船人浅论》(戴静华)、《匈奴及其族属问题》(朱映钩)、《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的南移》(董咸明)等等,分别获得了国家民委、省教育厅和本院的奖励。值得高兴的是一些年轻教师的科研活动也取得了成果,如郭飞平等合著的《超越困惑——中国传统间接致思方式考察》,谢国先翻译的《体态语言》,均已公开出版。本系学生编辑的论文选辑《史苑新苗》,已印出十期,有些文章曾在全省大学生论文竞赛中得奖或为其他刊物所转载。事实证明,本系师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科研工作。那种认为民族学院是三类学校,主要是培养中学教师,搞科研是“好高骛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或一个人,若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夜郎自大”,就会妨碍自己的进步。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云南民院历史系由于历史短暂,基础薄弱,图书资料不足,个别教师质量不高,少数学生根底较差,无论是教学工作或是科研工作,都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而一个学校或一个系要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宽松和谐的气氛,要能激发出广大师生勤奋好学的自觉性,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决非行政命令、临时措施、频繁的填表评比之类就能很快地改变面貌。

尽管如此，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这几年与过去相比，情况较好。有些教师说：现在系内总算相对平静，可以安心教书和治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自动发起编辑一个论文集，鼓励教师从事与所授课程有关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成果提供发表的园地。

文集编辑既成，付印前夕，征序于我。我虽未能一一拜读其内容，但认为即使其中部分文章质量稍差，这毕竟是大家发奋向上的表现，是今后有组织地开展科研活动的一个良好开端。故欣然命笔，略述本书编辑工作之缘起及个人在此工作数年之体验如上。是为序。

汪 宁 生

1990.10.15

目 录

序 言	汪宁生	(1)
宋代水利田考释		
—兼评江淮两浙的农业经济	吉敦谕	(1)
苏颂在政治上的地位		
—读《宋史·苏颂传》札记之一	蒋家骅	(68)
汉宣帝简论		
荀悦《申鉴》政治思想述评	文明元	(93)
试论观射父的宗教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寸崇德	(106)
陶李诗与庄子美学		
.....	蔡维琰	(112)
从启蒙向革命的回归		
—论陈独秀的文化启蒙观及转变	郭飞平	(126)
西学与中国近代思想界		
.....	方福祺	(140)
清代后期政治家赵光评传		
.....	汤明珠	(155)
略论李文学起义军的土地政策		
.....	余慧生	(169)
松山之战的历史地位		
.....	侯蕊玲	(182)
战后美日经济政策演变的历史回顾		
.....	张金鹏	(193)

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欧政策

- 杜鲁门主义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王晓华 (215)
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秦茂松 (228)

- 古代彝族的畜牧业和食盐煎销业述略 王宏道 (240)
读史札记三则 徐兴祥 (275)
说“屹立”图与“雷愚图” 刘亚朝 (287)
论云南古代的“青铜乐舞” 吴开婉 (294)
近年来苗族族源问题讨论综述 胡阳全 (306)

- 从神话传说看佤族猎头习俗的起源和演变 谢国先 (322)
试析民族传统节日的功能 高登荣 (334)
影视与民族学研究 龚箭 (344)
后记 (357)

宋代水利田考释

— 兼评江淮两浙的农业经济

吉 敦 谕

序 言

中国古代南方经济最早展现出大幅度地增长趋势，当远溯永嘉南渡之后。史籍表明，晋宋之际，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农业生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¹⁾的水平，尤其“三吴奥壤”，“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犹为殷盛”⁽²⁾。迨至隋唐，“天下大计，仰于东南”⁽³⁾，前此传统的关陕、汾晋、河洛诸区域的农业优势，几经沧桑，已被江淮所取代，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日臻根深蒂固。所以，开元时，裴耀卿主持漕运，得以“三年积粟七百万石”⁽⁴⁾；天宝时，继之舳舻尾衔，车毂扬尘，“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⁵⁾，盛唐的军国费用，舍东南漕纲北运，几乎难以支撑。降及五代，虽干戈扰攘，中原版荡，南疆割裂，然而，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⁶⁾，两浙州县“境内无弃田”⁽⁷⁾，“米一石不过数十文”⁽⁸⁾。

兼祧前代开发之业绩，南方经济再次显著地突飞猛进，是在两宋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以江淮两浙为中心，普遍

地兴起了“与水争地”、“与水争咫尺之地”⁽⁹⁾的拓殖热潮，各种名目的水利田，如圩田、围田、湖田、塘田、坝田、葑田、堨田、垸田、溉田、江涨沙田、海退泥田等等，在各地参差迭出，而且伴随着生产经验的成熟、耕作技术的优化、庄田租佃契约制的发展，佃客身份地位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遂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攀登到全国的峰巅，不仅后继蒙元一代望尘莫及，而且堪与明初盛世相媲美。

正是由于产自这片膏泽之野、足供“四方取给充然有余”⁽¹⁰⁾的颗颗粒米，跨出庄田塍畦，狼戾四方，所以它对于整个社会的巨大辐射力，便远远超过了它自身固有的高产指数所标示的价值，其轨迹所向，不能不强烈地波及到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制。

它在百货骈集的序列中，以其最为浩瀚的数量，充斥商品市场，随“淮浙巨商”、“闽商海贾”与难以悉数的米贩子，“水浮陆转，无所不至”⁽¹¹⁾，搭起乡村产地与集市、镇市、城市之间流通的桥梁，组合成以粮商为中介的商品经济网络，冲击着世代相袭的个体地域性村庄小农经济封闭的藩篱，促使着社会分工的裂变进一步扩大，为色々繁多的手工业、养殖业与经济作物专门化的独立发展，铺下了奠基石。

它是王朝财赋度支赖以岁岁攫取的渊薮，又理所当然地被冠以“两税”、“上供”、“和籴”等名色，由黄幡张挂的漕舟编纲，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以供中央朝廷三班文武的官俸、吏禄和数十万驻军的廪费；至于留州支援、封桩积存，更是垒如丘山。因此，管尽辽、夏、金先后剑拔弩张，

挑起争霸中原的战火，但，“田夫必亿兆于甲士，犁牛必百倍于战马”(12)，高度发展的江淮两浙农业经济，成了确保赵宋王朝三百年统治局面，而又能在强邻众矢之下，立于不破之地的物质基础。单就这一政治意义而言，两宋政权得以长存，与其说是靠百万大军的刀枪，勿宁说主要是靠江南农耕区水利田所生产的粮米(13)！

一、水利田释名及其起源

宋代水利田因“土风各有所宜”，基本上大致可分为北淤、南圩两大类。

淤田

淤田散布于河东、河北、京畿与京东西路，是利用黄河水系及各地川谷倾泄汇聚之水所裹挟流淌的肥沃泥土，沉淀淤积而成的膏腴之地。“水去而土肥”(14)，这对于改造咸鹵荒瘠不堪艺植的土壤，实有巨大功效。

照沈括所说，它“其末盖久”，《史记》所谓“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15)，可见至迟已出现于西汉，历魏、晋、隋、唐，宋乃大盛，有“一石泥数斗”，“万顷黄金钱”(16)之誉。宋代淤田大多灌淤与开渠、筑堰并举，由于淤质不同，形成“赤淤地”和“花淤地”两种，前者较优，地价亦高。淤田种稻，决定大面积引植，始于端拱初年(988年)；而自河北率先播种，则在淳化四年(993年)三月。淤田昭著于史籍的典型事例，是任提点河东刑狱兼河渠事的程师孟，于嘉佑五年(1053年)在山西的建树。他先利用在绛州正平县南董村的马壁谷水，劝导

农民“买地开渠淤浚田五百余顷”，继之，“其余州县有天河水（山水）及泉源处，亦开渠筑堰，皆成沃壤。凡九州二十六县，共兴修田四千二百余顷”，改造“旧田五千八百余顷”。旧田原亩产五七斗，灌淤后“所收至三两石”，亩产量遽然提高了四五倍，成绩斐然可观。在京东西，累岁所淤“咸卤之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宋政府于熙宁九年又调任程师孟提举京东西淤田，成功后也受到嘉奖⁽¹⁷⁾。

至于河北，“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姑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本以此塘泺为关河之险，阻止契丹南进兵马。有人认为这无疑是“侵蚀民田”、“岁失边粟”。沈括则说：“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¹⁸⁾包拯也说：“河北漳河淤地名为沃壤”，邢、洛、赵三州“民田约一万五千余顷，并是漳河左右良田”。熙宁中，河北大兴淤田，吴充诬之为“骚扰河北”，王安石以河北淤“出田几万顷，灌田四千余顷……并淤到卤地亦自万顷”等事实，说明河北“得良田耕垦”，“耕种百姓至群聚来京师，谢朝廷为之除（水）害，如何谓之骚扰！？”⁽¹⁹⁾，驳斥了愚妄之言，坚持了淤田之法。

开封府界引汴水淤灌也取得极大成就，淤田司的官田即达四十四万七千多亩，俞充在“熙宁中为都水丞，提举沿汴淤泥灌田为上腴者八万顷”⁽²⁰⁾。“陈留等八县碌地”，“引黄、汴河水淤溉”⁽²¹⁾，得到改造，尽成良田。冯京诬称淤田在京畿使“人极劳敝”，宋神宗查证的结果是：“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遂得麦”，“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土视之如细面然”⁽²²⁾，从而使造谣中伤之说不

攻自破。

圩 田

南方水田名目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以圩田为中心，形成水利网络。“圩田”一词始见于宋代文献，但“圩”字却最早出于《史记》，唐人司马贞《索隐》注为：“音乌，……中低而四傍高”，对唐代有无圩田未执一词。至宋，圩音围wéi，音墟xū，圩田亦称“围田”，“墟田”，见于史籍的记述，以致专门概括其特点者亦屡见不鲜。最早的是著名改革家范仲淹，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云：

“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²³⁾

其次，是科学家沈括。他身为钱塘人，又先后在扬、宜、秀、润州多年，素谙江南形胜，其所作《万春圩图记》亦云：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废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²⁴⁾

与此同时，苏州昆山人郏亶，在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论两浙水利得失时却又说：

“古之田虽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谓之‘段’，或谓之‘围’。今昆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犹有野鸭段、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围、盛熟围之类”。⁽²⁵⁾

南宋时，对圩田的解释较为确切的是诗人杨万里，他的《江东集·圩丁词十解》注云：

“江东水乡，隄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

水下，沿隄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²⁶⁾。

此后，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立《圩田》一条，载：

“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盖以水高于田，故为之圩岸。……凡圩岸皆如长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画云。”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6，也辟有《圩田水利》专目，但对圩田的释词，则全是照抄上引杨万里的文句。唯元人王桢《农书》卷7《围田》条所述别有新意，兹录于下：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后植诸将屯戍，因令兵众分工起土，亦仿此制，故官、民异属，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扞护外水，与此相类，虽有水旱，皆可救御。”

明朝的严讷也写过以苏松地区为背景的《论水利圩图》，姚文灏的《修筑圩坦事宜》，更是纤细皆备。然因其世隔遥远，于此可姑置不论。谨以上引两宋各家之说，参比其它零散记载，对宋代的圩田及其结构，可综括阐释为：

一、圩田主要是集中在江淮两浙地区，官、民依据当地江海渠泾纵横、陂湖塘荡濒年霖涝、地势低洼的自然特征，修筑堤埂，圈包田亩，从事耕稼，既防潮水冲荡、河渠泛滥淹没之患，又防久旱无雨、禾苗干枯之忧的一种水利田。

二、圩田的整体结构有三个基本层面组成：一是圩岸，即修筑护田堤埂；扞护外水者亦称“长堤”或“大埂”，高

如城垣，内复筑“子埂”围田。双层障水，以防浸湮。圩岸两脊，或植榆柳，或栽水杨，内植茭蒲，外种芦苇之类，阻杀水势，系固岸基。二是闸门，即沿圩岸修筑，多寡视圩田面积大小而定，功能是相机启闭，调节水旱，遇涝开闸排水，遇旱闭闸蓄水，并可阻隔浑潮，以免卷沙入内渠，壅塞水路。三是水沟，即于圩内按地势高下，分列田塍，建盖庄屋，田亩位位相接，在塍岸之间与子埂四周，开挑水沟，纵横贯通，以资灌溉。沟渠须常加疏浚，以免大水而宣泄不及，造成沟浍盈溢，浸没田园。

三、圩田与围田，同音同义，是一种类型和结构的水田名称，这从上引当时当地的“俗呼之名”、“农家所云”考察，殆无疑义。王桢也承认它们规制“相仿”，结构“相类”，建置方法，初无二致。只不过有“官民异属”之分罢了。由此可知，圩田（围田），实由预防水旱、保护农田正常耕稼的一种建置结构方式而得名，所以不论是湖田，还是塘田、沙田、坝田等名目的水利田，凡筑圩岸围包，并基本上具备以上结构从事耕稼者，皆可通称圩（围）田。

应当指出，王桢界定的“圩田”与“围田”有“官民异属”专称之分，与宋代文献中的大量记载不符。宋人把大地主的私有“围田”也迳直写作“圩田”，把官府的“圩田”亦写作“围田”，圩、围互通互用，绝非字若泾渭，有什么严格界线、特定属性。只不过宋代文献上，在记载私人围包田亩，围占、围裹、围圈水面时所称之“围田”，实含有兼并、侵吞土地之意。有的史家，圩围不辨，误以为是两种水田，褒“圩”贬“围”，殊欠失当！

宋人也有按照地区之不同，来赋予其专称的。如绍兴五

年（1135年）知湖州李光，即有“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明越湖田”⁽²⁷⁾之说。但这只是就各地最突出的问题做出的大致归纳，亦未免有偏颇之嫌。因为，“圩田”不仅仅局限于江东西，而“围田”即“圩田”，亦非苏秀二州所独有，至于湖田，更远远超出了明越二州之区界，遍布江东，浙西乃至福建。如前所述，无论哪一种名称的水田，凡筑圩防水旱而种艺者，宋代是皆可通称圩（围）田的。何以见得？请看以下史实：

湖 田：

“祥符以来，并（镜）湖之民，始或侵耕以为田。
熙宁中，朝廷兴水利，有庐州观察推官江衍，……乃立石碑以分内外，碑内者为田，碑外者为湖，凡碑内之田，始皆履亩许民租之，号曰湖田”。⁽²⁸⁾

简言之，侵占湖面，泄去湖水，于湖内高仰处作田布种，即称湖田。然而，“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²⁹⁾，这无疑就是圩田了。其例甚多，如：“熙宁中，以（落星）湖地高者为田，为三千八百一十一亩，置十九围”⁽³⁰⁾。名噪两宋的永丰圩，也是在“政和五年（1115年）围湖成田”的；绍兴府的鉴湖、明州的广德湖，亦皆“缘民间侵耕，遂作圩田”。⁽³¹⁾

塘 田：

“浙西诸州豪家大姓，于瀕河陂荡，各占为田，名曰塘田。”⁽³²⁾

同样，筑圩包占塘荡耕耘其中，亦称“塘圩”。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云：“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³³⁾。南宋谈钥对浙西湖州的塘圩结

构，有具体记述，很值得重视：

“田畴必筑塘防水，乃有西成之望。……筑围园合，具其中地势之高下，列塍域以区别之，涝则以车出水，旱则别入水，田有堤塘，自古然矣”⁽³⁴⁾。

沙 田：

“泽围下流，江海与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从而塞。……彼沙者岁月面积，辟以农隙”。⁽³⁵⁾

这种由江海潮水常年淤积而形成的沙田，亦称“江涨沙田”，早在北宋景佑三年（1036）之前，已出现于苏秀二州，当地百姓甚“蒙其利”。到南宋，从浙西扩展到江东、淮南诸州县，宋政府因见其利博，而有“起租税”、“刮沙田”之举。但这种始由农民与水争得的田地，被政府括为官田后，又“多为有力之家请佃，包占亩步”，或为“豪强坐据”⁽³⁶⁾。“黄云满坞沙田稻”⁽³⁷⁾，它的产量之高，不免令地主们唾涎，于是在明州，曾引起激烈地“争佃之讼”；在池州，也出现过耸动一时的地主乔廷臣与江从龙添租划佃、争夺沙田的事件⁽³⁸⁾。宋政府的江东制司虽设沙岸局统管，但多达二百八十余万亩的沙田，由于地主影射包占后多方逃避租课，而政府却收益甚微，无奈于乾道四年（1168年）竟榜示出卖。沙田筑圩耕种，宋代即称“沙圩”⁽³⁹⁾。

坝 田：

“浙西民田最广，……数年以来，濒（太）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⁴⁰⁾

这显然是由在田周围累筑高坝而得名，“坝子”即“圩子”，俗名虽不同，实际是圩田。